

轉徙西南天地間

皮以存著





轉徙西南天地間

皮以存著

• 版 權 所 有 •

轉徙西南天地間

作 者：皮 以 存

出 版：七 十 年 代 雜 誌 社

香港文咸東街八十三號三樓

電 話：5-458564

印 刷：大 千 印 刷 公 司

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

1973 年 12 月 版 • 定 價 港 幣 五 元 五 角

目錄

小引	一
一、一次戰爭中的旅行	四
二、空言與現實	一四
三、戰時的桂林	二二
四、交通的混亂和人事的糾紛	三三
五、軍中的腐敗及軍人之避戰	四二
六、由病態的苟安到幻夢的破滅	五三
七、強迫疏散的兩天	六六
八、自桂林到柳州	七六
九、廣西之潰	九〇
十、黔桂大動脈的栓塞症	一〇九
十一、骨肉流離道路中	一二九
十二、勝利前後的霧重慶	一五〇
附錄：關於「詠史」四首	一七三

小引

在抗日戰爭末期——一九四四年夏秋之間發生的湘桂大疏散，對西南各省的人民而言，是一場空前的災禍。

這一場災禍，是由國民黨軍隊的大潰敗而直接導致的。至於造成軍隊大潰敗的根本原因，則是統治階層的腐敗。

腐敗的統治，不但反映於軍隊中，也反映於地方行政中。不但反映於政治上，也反映於經濟上。不但反映於官場生活上，也反映於社會狀態中。因此，那一次的軍事大潰敗，是政治大腐敗的結果。

那一次的湘桂大潰敗，是緊接着那年四月中至六月中的河南大潰敗而發生的。這兩次大潰敗，使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這個政權的真面目。

在湘桂大疏散這一場災禍中，人民流離載道，死亡枕藉，他們所遭遇到的痛苦是難以形容的，損失是無法統計的。

就當時的廣西省會——桂林方面而言，在一九四四年夏秋之間，一共疏散過兩次：一次是從六月二十七日起至七月六日止，為期十天。另一次是從九月八日起至十二日止，為期五天。

由於許多人還是疏散不出去，所以，緊接着，在九月十三日，再由桂林城防司令部發出強迫疏散命令，規定：凡非負有戰鬥任務且經登記核准者，一律限於十四日下午六時以前，全部離城。這是最後的限期了！

但是，桂林防禦戰的開始，是當年十一月上旬的事。也就是說，從強迫疏散到戰事正式開始，中間有兩個月的時間。如果從六月底的第一次疏散算起，更有四個月的時間。在這一段相當長的距離中，如果是在一個有計劃、有效率的政府之下，如果是在一個愛護和信任人民、而其本身也獲得人民的信任與擁護的政府之下，人民所遭受到的災禍，是可以設法避免、或至少可以大大減小的。不幸的是，當時的國民黨的統治，是貪污、腐敗和無能的，從其本質上說，是同人民處於對立的地位的。從湘桂大疏散和湘桂大潰敗所暴露出來的種種，正是這個政權本質的一個嚴酷的縮影。

從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間，日軍渡過湘北的新牆河，掀起了第四次長沙戰事——亦即當時所謂的「長衡會戰」一起，到同年十二月初，敵人侵入貴州省的獨山止，這差不多半年的時間，對於西南各省、特別是湘桂兩省的人民來說，是一段空前動盪的歲月，也是他們遭受到空前慘痛的歲月！流徙、饑寒，傷亡，一天天更緊迫地磨折着他們；希望與失望，痛心與憤怒，也一天天以更大的強度刺激着他們。我，作為他們之中的一個，也在某些方面，身歷着和目擊着，心中也不斷地發生強烈的激動。

當時的那場災禍，到現在已經相隔了二十多年，但是重重的影象，却仍然深印在腦海之

中。當時所收集到和筆記下來的若干資料，也仍然保存在敝篋之內。重新回想和檢看了一下，許多印象仍覺得十分鮮明。這同時又觸發了我這樣的一點感想：如果全忘了過去，恐怕也會影響到對今天的認識；而爲了更好地認識今天，似乎也不妨憶述一下過去。在朋友的慫恿之下，乃開始整理了這一份材料。

當時，我是桂林的一家報紙的記者，由於職業的關係，曾在湘桂、黔桂兩鐵路及西南公路沿線地區，東奔西走地從事新聞採訪工作，直到一九四四年年底才到達四川的重慶。因此，比普通人有可能接觸得廣一些，感性認識也會多一些，雖然不能因此就說了解得比較透徹一些。正相反，由於在那個時候，我不過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，政治水平很低，人生閱歷亦淺，對於事物的觀察和想法，毋寧說是必然淺薄和存在着不少錯誤的。最多只能說，我曾盡可能地將我的所見所聞雜記了下來，並在主觀上希望它合乎事實而已。總之，這只能是用幼稚的筆墨寫下的浮淺的記事。

現在，就開始講述那些二十多年前的「故事」。

一、一次戰爭中的旅行

一九四四年五月尾開始的長沙戰事，初時並沒有給一般人帶來緊張、興奮、或者是憂懼。

尤其是離戰場較遠一點的桂林市的居民，毋寧說是因為受了前此所謂「長沙三捷」的宣傳以及報紙上官方戰訊的濫調的影響，而懷着某種不切實際的期待。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，由於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將軍的號召，一個慰勞湘北戰士的義賣和獻金運動，應時而展開。

李濟深將軍雖然身為桂林辦公廳主任，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，他的實際權力，其實是與他的職位不相稱的。在他個人的歷史以及他與蔣介石之間，一直隔着一條鴻溝，因此不可能得到後者的真正的信任。蔣介石手下的親信官員以及那些驕兵悍將，事實上都不會接受他的指揮。只因爲他是廣西的資深軍人，而桂林辦公廳又設在廣西的省會，蔣介石爲了人事上的運用，才給了他這樣的一個虛銜，作爲羈縻性的安置。另一方面，也正由於如此，李濟深將軍在開明人士的心目中，却成爲可以寄予希望的對象。而事實上，在當時使人感到窒息的政治空氣下，他也有時能夠給與若干開明人士以有限的蔭護與幫助。李氏號任潮，許多人口中都稱之爲「任公」。與他同時、年紀也復相若的，還有另一位「任老」，那是指廣西省參議會議長李任仁。兩「任」對於某些不合理現象，都還能在一定的限度內，發表一點公道的意見。所以，當

時的義賣和獻金運動，在李將軍的號召之下，曾獲得相當熱烈的反應。

義賣和獻金運動的結果之一，是由桂林各界組織了一個「湘北慰勞團」，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三日出發赴湖南慰勞。我受了我所服務的報館的囑託，隨團赴湘，因而有了一次戰爭中的旅行。

那時候，不但桂林沒有準備疏散，就算已經準備疏散的衡陽，疏散工作也還沒有正式開始。可是作為東南運輸動脈的湘桂鐵路，已經顯得十分繁忙，其行車秩序也已開始陷入混亂了！「湘北慰勞團」乘坐的班車，按照行車時刻表，是應在當天下午六時三十分從桂林開出的。可是直到午夜十二時，列車才從柳州到達桂林南站，誤點達五小時以上。再又爲了當夜有幾個比較高級的文武官員遲遲未上車，竟使列車耽誤到凌晨二時才能够離站北開。這種現象，對今天才三十歲上下的讀者而言，或者會引爲怪異，但在當時的那個中國社會，却並不算是怎樣偶然的事例。

那天夜裏的桂林火車站上，除了擁擠的乘客和待運的物資之外，還有不少揹着衝鋒槍的軍隊和軍用物資，都是急待趕往衡陽和湘北前線的，但都爲了「恭候」那幾個官兒而大受遲誤了。

湘桂鐵路桂（林）衡（陽）段，約爲三百六十公里。即使是普通客車，如果正點行車，傍晚離開桂林，第二天午前也可以到達衡陽了，何況我們乘坐的又是直通快車。可是，當時我們乘坐的列車，開了個通宵，到我在晨曦中醒轉過來，發現從窗邊映入一片水光，空氣也顯得特別清新，下意識地感到，這絕不會是衡陽，立刻問一下車僮，才知道剛到了廣西境內的靈川縣

以北，興安縣以南的大溶江站。原來火車走了這許多時間，僅僅不過走了四十五公里！還未直接地接觸到戰爭，交通就已顯得如此的不濟了。

天亮之後，火車停停走走，走走停停，秩序繼續失常，叫人生氣。在這次赴湘之前不久，我剛讀過法國作家莫洛亞所寫的「法國的悲劇」，這時候陡然覺得，那本書有不少地方，也可以移過來作為抗日戰爭中國民黨統治區的寫照。尤其是書中所寫上層的惶亂與無能，特權階級把私人利益放在國家民族利益之上等等現象，非常相似。其次，在巴黎淪陷前後，各種謠言所造成的破壞作用，和當局對於為廣大人民羣衆所迫切關心的戰訊的發布之虛假等等，在那時候湘桂鐵路沿線地區，也已愈來愈多地出現了。

我們乘坐的直通快車，一直駛到出發後的第二天（六月十四日）下午七時，才終於到了衡陽，誤點時間在正常時間的一倍以上。

那時候，雖然常有空襲警報，但是，下車後所見的夜衡陽，仍然燈火燦然。不過，畢竟是在疏散的前夕了，若干商店的貨架已經搬空，大宗交易實際上已經陷於停頓，小買賣也已到了「半開門」狀態，百貨店則多在夜市中作廉價的拍賣——這一部分商人是因為意識到交通已陷入混亂，要將貨品運走，頗不容易，除非能夠走後門，託人事。但若然這樣做，將明的運費及暗的賄賂加在一起，也並不見得上算，倒不如趕緊求售，早點換得現鈔，俾便他遷。

從街頭的情況便不難察覺出來：人們對於自己的正業，已因時局不安而流於荒廢，大家整天東奔西走，到處打探時局消息，因此街頭都擠滿了人。有些人是神色惶惶的，有些人却又顯

得無聊而懶散。這兩種從表面看來極端相異的人，實際上却有一個共同點，那就是：對於當前的情勢都看不清，對於即將到臨的變化也抓不準，因此都心神不定。人們對於官方發布的「有利」戰訊都將信將疑，只有市政當局在故持鎮靜，企圖藉此安定人心。但是，大家有目共見的是，由粵漢鐵路撤退過來的難民一天比一天多，他們都各有各的經歷，比方在火車上怎樣擠傷擠死了人，又比方軍隊紀律怎樣敗壞，諸如此類的話一傳開來，自然立即在人們心中投下了陰影。同時，在當局宣傳長沙前線勝利聲中，衡陽已在手忙腳亂地趕挖防禦工事。這等等活生生的情景，都使悶在時局的雲霧裏看不到實際的人們，大感迷惑與不安。即使是一個短暫的過客——就例如我這樣的人吧，一腳踏進衡陽，也已嗅到足夠的不祥的氣味了。

當我們到達衡陽的時候，衡陽的軍事部署，距離官方宣傳中的所謂「完妥」還很遠很遠。就在不久之前，亦即「常德會戰」之後，國民黨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，曾受到降職處分，要他卸除軍長職務，改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高級參議。但他還沒有辦理移交，因為湘局緊張，又奉令回任軍長，「戴罪立功」，駐守衡陽。該軍在第三次「長沙會戰」後，還沒有補充好，兵員殘缺，再加上人事上的朝令夕改，問題重重，可想而知。過了幾天，黎行恕的四十六軍中的新編第十九師（師長羅活），開始從廣西增防衡陽，對於衡陽的人心，才似乎起了一點安定作用。四十六軍在人事歷史上屬於「桂系」，而建制本在張發奎的第四戰區。現在却要調到湖南去，轉歸第九戰區的薛岳使用，在人各為己的社會背景下，內中也潛藏着若干不愉快的軼轢。這是一個方面。

另一方面，在緊張空氣籠罩之下，再去細心觀察一下，更覺得問題重重。在薛岳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由株州退到三門江之後的有一天，我曾到衡陽四郊去走了一趟，看到在衝要地區和某些高地上，零零落落有些黃衣的兵士，在散散漫漫地挖掘工事。那些兵士都是羸弱的、黃瘦的，就算一小鍬、一小鍬地挖泥這種輕體力勞動，對於他們來說，已經成爲難於勝任的負擔！我對於軍事雖然是十足的門外漢，但看到那些建築在重要地點上的機槍陣地，祇靠一些直徑不過兩寸的杉木作架，上面再鋪一點薄板，薄板上再鋪一點黃泥也就作數，實在很懷疑，它們即使在手榴彈和白砲等輕武器攻擊之下，能有多少抵抗能力，更不要說在遭到敵機炸彈和重砲攻擊時的後果了。後來，我拿這些情形去請教某些高級軍官，他們也認爲不濟事，但是限於物力，只好如此。而且，即使是構築如此的工事，進行得也並不認真。那時候，衡陽市面上每天有許多大卡車在忙着運傢俬，運商貨，但運木料和石頭到市郊去構築工事的，差不多都是靠人的肩挑或手推的板車。這些情況，叫人處處看到腐敗的裂痕，預示了危機之必至。

就我的接觸所及而言，許多由前線來到衡陽的人，都是談論汽車輪胎、長沙麻布的多，總之是談論商貨時價或個人損失的，遠遠多於談論戰事和大局。這都證明了當時被目爲「謠言」的傳聞，並不是謠言而是事實。那些傳聞說：長沙戰事打響之後，亦官亦商的有力者，大家都先忙於爲自己的生意着想，由汽車到木船，都被他們爭先恐後地拿了封條去封來趕運私人物資，至於軍運交通，都被拋諸腦後了。

那時候，從火線上帶到後方來的一個感慨是：逃兵多。因此，部隊每經過一次戰鬥或移

動，因逃亡而致的兵員損失，往往較之因傷亡而致的損失更大。在衡陽逗留的期間，有一種情況使我相信上述的說法，這種情況就是：到六月中旬為止，長沙戰事已打了半個多月，但我在衡陽隨處採訪，始終很少看到傷兵。逃亡多於傷亡，是國民黨軍隊上層貪污、黑暗的惡果之一。而兵源的解決，不依靠政治動員而只依靠強迫拉丁，當然也是重要原因。

薛岳在湖南的長期統治，貪污腐敗，不但老百姓很有反感，而且與當地的上層人士，不斷地發生利害衝突，關係很不諧和，後者常常譏諷地說：「薛伯陵是成功了，但湖南的政治却失敗了。」當然，他們都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說話；不過由此也足以證明，他們彼此之間，由於爭權奪利而引致的裂痕之深。「戰區」與地方之間的不合作，軍民之間的不合作，在戰爭過程中，愈來愈暴露得徹底；這也是一個原因。

衡陽的情勢雖然已經是這樣緊張，但由官方主辦的一個俱樂部——「衡蓮社」，却正在這時開張。每天晚上，都有不少人擁在那裏跳舞。我曾到那裏去看過，在壁燈的光影下，靡靡之音不停地吹奏。裏面有酒，有咖啡，有涼飲。那是被不安包圍着的衡陽的一片「樂土」，那是充塞着緊張空氣的衡陽的一角「冰涼世界」。

當局在這樣的時際來開設舞場的唯一「理由」，是所謂「便於招待盟軍」。但元宵夜夜在那裏尋歡作樂的，百分之九十是銀行界、暴發商和無聊而又有錢的紈袴子弟（「三教舞廳」的情形也一樣）。衡陽市長（兼警備司令）也常是其中的座上客，他能穿着中國長衫而演出嫵熟的舞姿，還被人當作美談而流傳衆口。那位市長，與當時身為贛南專署專員的蔣大公子蔣經國

的私誼很深，正由於這種關係而得到了特殊的信任。

「衡蓮社」的開辦費花了四百萬元。但那時敵機常常來襲的衡陽，有二十多萬居民，却因當局以經費缺乏爲理由，以致四郊竟連一條防空壕也沒有。六月十五日深夜，敵機來襲，我也狼狽地奔到郊外，在野墳邊上，嘗過了藏身無地的空襲滋味。那次空襲前後歷兩小時，敵機投彈數百枚，湘江大橋附近，死傷了六十多人。但在這一段混和着火與血的時間降臨之前，在「衡蓮社」內還響徹着迷人的舞樂！

爲了「招待盟軍」，衡陽市內那家唯一的新型大旅館——「勝利大廈」，事實上早已撥作他們的淫樂之所。那時候，像廣西省內的城市一樣，衡陽也劃出一定的地方，作爲特區，讓娼妓公開營業。那些被生活迫入火坑的可憐的婦女，都要登記領證。由於「盟軍」方面要求保障「衛生清潔」，有關的官員，由市長到衛生局長，都要格外關心。衡陽全市只有二十多萬的人口，而接受檢驗、登記領證的妓女，竟有五千多人。況且這只是公娼，私娼和另一些變相的私娼——舞女，還未計算在內。試想想，五千多人已佔衡陽總人口五十分之一，如果將總人口中的男人及尚在童年的男女除去，則公開靠皮肉生涯度日的人口，其在當地成年婦女人口中所佔的比例，何等驚人！單從這個小側面去觀察一下當時的社會，就可以意味得到，那是一個多麼黑暗的社會！

在那間「勝利大廈」裏，本來已經設有一所舞場，但由於生意太忙，所以又再動用了四百萬元，增設一家上面所提到的「衡蓮社」。

當時，「湘北慰勞團」帶了二百多萬元，原來是準備到前線去直接分發的，但一再等待，一再請求，都沒有得到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的同意。因此，除了在衡陽郊區參加了一次空軍慰勞會之外，只好依照對方的意見，將慰勞金交給「長官部」駐在衡陽的經理機關。我們去交款時，曾與負責收款的一個科長作過簡短的談話：

我們問：「慰勞金收到多少了？」

他說：「有四千多萬了。」

我們又說：「發動慰勞不過半個月，就有這樣的成績，真算不錯啦。」

他分辯地說：「不。有些錢還是第二次長沙會戰時留下來的。」

我們聽了，都不禁有點驚愕。然後，大家帶着深沉的思慮，默默地走了。我當時想，所謂「第二次長沙會戰」，是一九四一年九、十月間的事，離開現在差不多已經三年，而當時由各地捐獻的慰勞金，竟然到了而今，仍留在「長官部」的經理機關，沒有發下去！誰都明白，那時候國民黨軍隊裏的經理機關，往往就是替高級軍事官員進行貪污中飽及營商圖利的組織，他們為什麼不允許我們到前線去直接分發慰勞金，從這裏也就可以得到答案。我同時也想起了當時那些帶着用血汗換來的錢，跑到桂林「社會服務處」去獻金的報販以至乞丐的熱情，才憬然於我們和他們，都同樣受到難堪的欺騙！

我們在衡陽呆到了六月十八日，因為衡陽開始強迫疏散，也就離開了。

在我們離開的前兩天（六月十六日）起，衡陽西站便開始紊亂。車票黑市出現了，軍人卷

屬帶頭搶車撤退，這比任何官方的戰訊都有效，使大家明白戰局的發展不妙。於是火車站上，由裝在籠子裏的鷄鴨到拆卸下來的鍋爐，由大包大包的棉紗到金漆生光的馬桶，隨處堆成小丘，連通道都給壅塞了。在毒熱的六月的驕陽下，一羣羣的人，上氣不接下氣地奔來逐去，爲的都是車皮和車票。連黑市票也弄不到手的，就作搶車的準備。有些在衡陽西站上不了車的人，則跑到下一站去再截車……總之，一切都開始陷入混亂了。

在六月十八日下午五點鐘，我們「慰勞團」的人，被送行的人硬推進了一個二等車廂的房間，不一刻，整個房間，被那些跟着我們，乘機從房門及車窗兩處，前推後擁地擠進來的人行李雜物塞滿了。大家在這個小房間裏，悶等了差不多兩個鐘頭，誰也不肯離開也不敢離開。大人的痰涎汗臭，小孩子的大小便，哭聲，罵聲，在這小小的房間，混成一片。人被擠得癱軟，頭被薰得暈眩，心却焦煩得要爆炸。

直到差不多下午七時，車終於開了。車上立刻透出一片叫聲，好像悶得要命的人的心都突然開了閘一樣。這時候，我檢看一下房間裏的情況，一共擠了十五個大人，八個小孩，二十件大小行李，快要擠到密不通風！但比之那些在月台上失望地看着車開的人，我們總算有機會與貨物馬桶等同車，離開亂作一團的衡陽了。

那天夜裏，在火車上，許多人都睡不着。擠在我們那個房間裏的，大半是衡陽附近的鄉下女人，她們爲了要使孩子不哭，只好整天地把奶頭塞到孩子的嘴裏去。那些鄉下女人，她們在桂林都沒有親戚或朋友，只是覺得逃出了衡陽就等於逃出了即將到臨的死亡。就是這樣的一點

求生的慾望，使她們搶上了火車，奔向她們還完全不知道它是個什麼樣子、且將如何生活下去的桂林。就是這樣的一列火車，在迷濛的夜色中，不知還裝着多少同樣的人，和同樣渺茫的希望！